

宁波好书

文化的守护者 历史的见证人

——《宁波市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精品选编》读后



贾刚 姚佳倩

宁波市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记录了宁波发展变迁的点点滴滴，能引领我们回望文明深处，思接古今，激发知宁波、为宁波、兴宁波的文化自觉。为了让档案文化“飞入百姓家”，《宁波市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精品选编》择取31件档案精品，既有记载艰难奋斗历程的企业实录，亦有承载优良家风家训的家谱，既有王阳明的手迹刻板拓本，亦有当代书画名家的代表之作，带我们回顾历史的波澜壮阔，感受先辈的时代风骨，见证文化的守正创新。

重工兴商开拓闯荡，爱国爱乡造福桑梓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号召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40周年。200年前，宁波借助“宁郡六邑”的地缘优势，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以上海为中心扩展到全国，赢得了“无宁不成市”的美誉。与此同时，商脉与文脉水乳交融，孕育出“宁波帮”的人文精神。

《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从1905年开创新之初的艰难运营，到发行债券步入快速发展；从俞佐宸临危受命扭转困境，到一场大火致厂房设备付之一炬；从民营企业改制为公私合营，到1993年企业难以维持宣告破产。面对创业的艰辛，自强不息，面对激烈的竞争，敢为人先，虽最终被时代淘汰，但体现了“宁波帮”敢于开拓、善于创造、奋勇争先的气魄和胆略。

《重建灵桥纪念册》记录了“宁波帮”为新建钢拱灵桥筹备、募捐、施工的全过程。灵桥原为木制船桥，断链、沉舟、溺人的惨剧时有发生。1922年至1926年，曾有两次颇具规

模的改建筹备活动，却都因为战事而中止。1931年，旅沪宁波人乐振葆、张继光两次赴甬，推动了第三次筹备改建行动。至1936年6月，钢拱灵桥终建成，自此“车水马龙过，行人笑语盈”。修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体现了“宁波帮”树高不忘根、报效祖国、回馈社会的赤子情怀。

志书记录时代变迁，沧桑巨变大道如砥

方志的纂修，是基于经世致用的理念，泽被后世的情怀，历来为地方长官和缙绅士子所热衷。纂修的过程如同一场修行，“才以应物，学以树本，识以烛理”，三者不可缺其一。

光绪《慈溪县志》，是慈溪在清代修成刊印的最后一部县志。全志56卷24册，180余万字。《中国方志大辞典》称其“篇幅浩瀚，人物传尤为突出，虽繁而不失清晰，为后人所赞誉”。该县志纂修历时8年，至刊刻出版又历12载，20年间几经中断，其中的艰辛少为人知。以杨泰亨为代表的编纂人员尽管职位有高低、能力有大小、风格各不同，但都胸怀报国志向、关心乡邦文献、克服诸多困难。在志书编修过程中，创新性地将生活中所积累的有关信息和体会融入其中，从而凝聚成“体例完备、信而有征、述而有作”的志书精品。

据《宁海县志》记载，清顺治年间，大臣冯溥奏请在崇文门外创建育婴堂收养四方孤孩，于是各县竞相效仿。当时中国正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连年征战，饿殍载道，“邑民之无室者十人而五”，弃婴现象愈演愈烈。宁海育婴堂最早建立于顺治年间，堂址位于县城妙相寺侧（宁海城中小学附近），咸丰年间被毁，同治七年开始复建。20世纪80年代初，在育婴堂原址新建县边防大队办公楼时，工作人员在废纸堆中意外发现了一批同治年间开始的“育婴堂档案”，其中记载了县令周祖升为维系宁海育婴堂运营，向地方

乡绅筹募资金，以及日常运营、开支等情况。据统计，从同治至清末50年间，宁海育婴堂共收养了数万名弃婴，可谓弘济时艰、功德无量。

世族宗亲传袭家谱，赓续血脉传承家风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深深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血脉。“家谱”作为姓氏宗族的档案，既记录了一个家族的世系脉络，也承载了这个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

奉化大堰徐家村的“徐氏宗族”是东汉年间丹阳侯徐饶之后，徐氏族人先后出了13位进士和12位举人，至今在徐家村还流传着宋孝宗年间“徐琰七岁差役马站”的故事。“慈溪冯氏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开元二十六年，是浙东历史上家族人口最兴旺、文化最丰富的巨族之一，冯骥才曾为冯氏家谱题写“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镇海十七房《郑氏族谱》始修于乾隆三十六年，编纂者有感于先祖自宋南迁以来历十世而未修谱，虽“亦未为裕”，仍决意“割产之半，以田助祀”修谱。

栉风沐雨功留青史，国土无双风骨长存

在历史的长卷中，有一些人虽没能家喻户晓，却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明嘉靖褒奖匾”记录着一段父子英雄事迹。嘉靖年间，倭寇经常骚扰东南沿海一带，慈溪人民深受其害。义士杜文明受命在当地组织乡勇抗击倭寇，其子杜槐担心父亲年事已高，便挺身而出，代父受命。杜槐卖掉家产田地，广招骁勇，组建武装。每次出战倭寇，奋勇冲杀，屡建奇功。嘉靖三十四年，杜槐带领乡勇在长溪岭与倭寇遭遇，他身先士卒冲杀敌阵，激战了整整一日，终因体力衰竭、身负重伤坠马而死。杜文明闻儿子为国捐躯的噩耗，拭干眼泪，重整队伍，亲自挂帅，继续与倭寇斗争。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将军，在奉化枫树岭的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嘉靖帝为表彰杜文明父子的英雄事迹，亲赐“褒奖匾”存于白洋湖畔的忠义祠。1940年日寇侵入浙东时，杜姓族人趁夜色偷偷把“褒奖匾”从忠义祠转移隐藏，才得

以保存至今。

“魏长春医书”包括《验案类编》《失治案记实录》《临床经验选辑》等，凝结了作者从医70余年的心血，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作。魏长春是宁波慈城人，16岁从药店学徒做起，先后跟随名医姚精深、颜芝馨诚挚苦求学，接方配药渐熟医理。20岁起在宁波慈城卫生堂药店坐堂，其辨症不计报酬、细心负责、大胆用药，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在宁波一带声名鹊起。“知我罪我，在所不计”，魏长春根据自己52则诊治失败的病历编写了《失治案记实录》，自述这些病例“或记录诊断失实，治疗错误；或用药不善变成绝症；或缘病者不知卫生，酿成巨祸；或因疑难险症，无法挽救”，希望医者能引以为鉴。其较较之匠心，令人肃然起敬。

悉心呵护艺术精品，古今文化交相辉映

档案担负着集聚和保存文化财富、延续民族优秀文化的光荣使命，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呈现档案中的文化艺术精品，让古今文化交相辉映，让宁波的“美”看得见、摸得着。

1852年前后，“三老讳字忌日碑”被慈溪横河的一位农民在客星山取土时发现。“三老”是汉代的一个官名，即掌管教化的乡官。此碑意在告诫后人，铭记先祖功德，不要触犯忌讳。此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经典之作，堪称秦篆汉隶书法演变的活化石。20世纪初，此碑流落到上海，一个日本古董商欲出高价收购，在沪的浙江同乡得知消息后，筹款将此碑赎买下来，藏于西湖孤山至今。

2022年，奉化籍书画艺术家王利华先生为支持家乡文化事业发展，捐赠了230件个人作品。《河姆渡文化之光》山遥水远，彼岸花开；《灵山保国寺》曲径通幽，云淡风轻；《人间弥勒》神态庄严，惟妙惟肖。这些画作独具宁波特色，是传统与创新结合、工笔与写意交融的艺术精品。王利华在洞悉家乡山水韵致的基础上创作的这些中国画，不仅在圈内广受赞誉，还实现了文化出海，提升了文化国际传播力。

于时光碎片中窥见历史，于卷帙浩繁中展望未来。《宁波市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精品选编》掇菁撷华，以档叙事、以档立言，既记录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当代档案工作者的匠心独运。

《春节简史》



作者	张志春
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1月

《春节简史》是著名民俗学家张志春教授送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从冬至敲响春节的序曲、腊八拉开春节的帷幕，直到元宵宵节迎来年节的尾声和高潮，每一个美妙的时间节点都关联着中国人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每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背后都印刻着中华民族的奋进脚步和精神脉动。

春节绵延千年，许多历史细节已难以考证，这也使春节的历史有一种神秘感和朦胧美。春节习俗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然而变化的方式是，不变的却是那份心意和情感。祭祖敬神、贴门神、请灶神、贴春联、贴窗花、舞狮子、猜灯谜……有的习俗沿袭千

年，形式上已悄然发生变化，如祭祖对象从传统的“君”更替为现代意味的“国”，压岁钱的仪式感超过实际价值等。年俗的“变与不变”，让人意识到传统是与时俱进、不断向未来延伸的。

春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面貌和情感寄托。当春节的序幕拉开，心底总会回响起亲切而神圣的召唤——回家团圆！在一年又一年向着团圆的奔赴中，我们将春节的精神密码与文化基因深深复刻。而这份团圆的愿望，不仅是属于家庭的、家族的、家乡的，最终将汇聚成国家的团圆、民族的凝聚。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春节意涵中对春天的期盼、对历史的敬畏、对生活的祈愿、对亲情的挚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春节意涵中对春天的期盼、对历史的敬畏、对生活的祈愿、对亲情的挚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据不完全统计，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约200个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

春节，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盛宴，一次次心灵的洗礼和文化的传承。（推荐书友：李钊）

《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



作者	李亮
出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日期	2024年1月

参商不相见……神话传说背后是远古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它们涉及宇宙结构、天体演变、星辰运转、日影测量、干支历法等一系列天文学基本常识。

我们的祖先创立了独特的天文学体系。比如甲骨文中使用的干支纪日法，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彗星图案，海昏侯墓出土的计时奇器铜壶漏刻，祖冲之与《大明历》，敦煌的《星图步天歌》，宋辽金时期的历法较量，郭守敬与《授时历》……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的主干。但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被牢牢把控在统治者手里，因而很难走出规则的圈限，很难有新的理论建构与突破。

作者李亮在序言中指出：“在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也与政治（特别是皇权）紧密相关，甚至长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统’之学。”这句话，可视为全书提纲挈领的写作宗旨。

中国古天文学的起源带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女娲补天的五色石，可能指向了极光贯穿紫微垣的壮观景象；后羿射日，“日中有骏鸟”，这是先民注意到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夸父逐日，先民重黎绝地通天，闾伯与实沈

笔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天文成就。中国积极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成员，同时保留着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化要素，向着浩瀚的宇宙，以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继续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推荐书友：林顿）

学风求正 文史求真

——竺济法《茶史求真》读后



汤丹文

2023年中秋时节，收到了竺济法先生《茶史求真》一书。竺老师是我的老熟人了，相识近30年。他又是南派四明文坛的特约作者，开设的“茶竹居说茶”专栏已超70期，其用心和勤勉，非常难得。

竺老师浸淫茶文化已有40年，记得20世纪90年代，上海曾出版一套风行国内的“五角”丛书，其中《名人茶事》就是由竺老师编写的。当时，他走的是茶文化大众传播和普及的路子。及至新世纪初，他开始关注并从事茶文化的

学术研究，已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茶文化论文30余篇。

竺老师的学术研究拓展到茶文化的角角落落。《茶史求真》分六辑，分别为“溯源辨正”“陆羽与《茶经》”“茶史探微”“茶禅辑要”“茶史撷英”“宁波茶史采华”等，“溯源辨正”自然是本书最重要的章节。

这些年来，随着“茶为国饮”的意识深入人心，茶文化传播和研究也空前繁荣，但热闹之中，不免泥沙俱下。也许在竺老师眼中，令人难堪的一点就是各地、各方从本位的利益得失出发，“虚假的茶史茶事，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而这些虚假的茶史茶事得到了所谓专家、大家甚至权威的认可”。一些地方宣扬茶文化好大喜功，在没有学术依据的情形下，“考古”“求古”现象严重，虚构所谓茶祖，茶史被无限前推。而茶叶市场借所谓“故事”，炒高价格，让非专业人士一头雾水。

书中，《各地四种茶文化“宣言”“共识”中的茶史与学术错误》一文，尤其振聋发聩，他对四川雅安有关人员将南宋之后出现的虚构僧人吴理真臆断为公元前53年“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的茶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吴理真：提出多种人物元素之南宋虚构神僧》一文中，竺老师又钩沉爬梳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再次论证当代一些人士刻意“指鹿为马”，虚构吴理真为蒙顶山西汉茶祖，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诚信。

历史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竺老师深知这个道理，在茶文化的研究实践中，去伪求真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他的一些文章，触及了个别地方、某部分人的利益，这“穷原竟委善求真”的执着，与他不媚俗、不怕得罪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在《当代陆羽研究之伪命题三例》中，对“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终老湖北天门以及陆羽与女诗人李冶是恋人之说，都提出了不认可的意见和结论。这让湖州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西廷拍手称快，认为其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理直气壮”。而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著名茶文化专家王岳飞亦称竺老师为“茶文化界最说实话之学者”。

竺老师曾对我说，茶史上一些所谓的权威说法，很多人亦云亦云，以讹传讹。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而通过他的研究，该语最早出自清代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而陆羽的《茶经》也没有《神农本草经》茶事记载。不过，这并不影响神农作为中国“茶祖”之地位。他认为，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引用至学术文章中，无异于“皇帝的新装”，令人不齿。

当然，竺老师的《茶史求真》并不全是质疑，在很多文章中，他遍寻史料、历经考证，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说法。

比如，“吃茶”禅语作为茶文化第一公案，早已广为传播，一般人认为赵州高僧以谏应为源头。而竺老师经过细致考据，确认明州天童寺咸启禅师在稍早之时已有“且坐吃茶”之说，两者不约而同。他进而提出“天童寺是中国茶禅文化三大源头之一”的观点。

在《历代三地“茶都”之形成与兴衰》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东晋、南北朝之建业、建康（今南京），唐代之湖州，以及宋代以来的杭州，为有史以来中国三大著名“茶都”。竺老师在茶叶产区、标志性茶人茶事以及茶文化诗学典故入手，收集了三大“茶都”翔实的史料和证据，其观点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

在此书的附录中，竺老师这样总结自己多年研茶文化的心得：以工匠精神从事茶文化学术研究。此言不虚，如同真实亦不虚。“学风求正，文史求真”，是竺老师赠我此书时扉页上题词，也是这些年来茶史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

《不如吃茶看花》



作者	周华诚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3年11月

作家周华诚喜欢喝茶，却不以其为傲，他不过将吃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记录与其相关的生活碎片，并非就吃茶本身展开长篇大论。在《烟霞百里间》一文中，作者写自己泡了野山石墨，顺便将野山石墨的照片发到网上。此时一位懂茶的朋友回复，“你的石墨并非顶级。”在石墨的鲜叶采摘标准中，一芽一叶为特等，而作者的茶叶，叶子多，可知一般。作者不信，“继续喝野山石墨，还是很香。”这便是作者观念的独到之处了——吃茶，讲究的是个人的心境和感受，而非各种标准。

写茶，作者并不局限于茶，以其为尊；写吃茶的日常生活，作者又并非不加选肆意记录，而是

着眼于“闲情”二字，书写悠闲的日常生活。有时，作者手捧一本安倍夜郎的《酒友饭友》，啜饮一杯涌溪火青。安倍夜郎的散文是清淡一派，如涌溪火青，耐回味。作者也喝熟普洱茶的老茶头，顺便翻翻俳句诗人正冈子规的《子规岁时》，揣摩日文俳句的诗意。作者的文学悠游自在，涉及生活中的种种话题——看书写作、山水风景、人文历史。

生命的闲情，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你拥有多少空闲的时间，而在于心境。在《葛根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作者记录了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过程，但他并没有陷于身体的苦痛或者精神的担忧中，而以乐观的心态应对一切。作者住进酒店后，虽然昏昏沉沉，但仍然在洗澡的时候“舒服得直哼哼”，甚至在胃口还可以的时候，吃上两个橘子、十来颗桂圆和一个梨。作者不仅细致描写了食物，还强调梨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冰的，吃起来真叫一个爽快”。

《不如吃茶看花》适合吃茶的人读，更适合有闲情的人读。（推荐书友：金夏辉）

